

对苏联全盘集体化时期富农迁移问题的历史考察

徐隆彬

【内容提要】 联共(布)党内就全盘集体化条件下如何处置富农的问题讨论酝酿近一年后,斯大林公开提出了消灭富农阶级的口号,接着联共(布)中央做出了关于剥夺和迁移富农的决议。在迁移过程中,迁移对象不断扩大,且在全盘集体化运动结束和农业集体化完成后迁移工作仍在继续,以致最后变成了对犯有各种过失的非富农户和集体农庄庄员的迁移。这些人被迁之后成为了各种权利都受限制的特殊移民,命运极为悲惨。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生产和生活境况虽逐步得到了改善,但直到1950年其死亡率仍高于出生率。卫国战争爆发后加大了解除这些人特殊移民身份的力度,但到斯大林去世的1953年,他们中的一些人仍背负着这种身份。

【关键词】 苏联 全盘集体化 富农迁移 特殊移民

【作者简介】 徐隆彬,1960年生,山东《潍坊学院学报》主编,研究员。(潍坊261061)

关于苏联全盘集体化时期的富农迁移问题,虽在国内外的一些苏联史学论著中多有涉及,却未见有较为系统和深入地研究该问题的专文发表,因此笔者想借助有关档案资料,在本文中专门探究一下这个问题。

一 迁移政策的酝酿与出台

新经济政策实施后,联共(布)对富农一直采取的是鼓励其发展经济,限制其剥削趋势的政策。虽然随着富农经济的发展和党内斗争的加剧对富农的限制越来越严厉,乃至对其采取了不少过火行动,但直到1929年冬斯大林公开提出消灭富农阶级,即剥夺和迁移富农的口号之前,富农都是被允许合法存在的。那么,斯大林为何在这个时候

提出了这一口号,这一口号真如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提得太过突然吗?事实是,在斯大林提出这一口号之前,联共(布)党内就在全盘集体化的条件下如何处置富农的问题已讨论酝酿了近一年的时间。

这一讨论是从是否允许富农加入集体农庄开始的。

进入1929年后,苏联农业集体化的速度明显加快,还在这年的3、4月间,乌克兰等加盟共和国就提出了整村整村转向全盘集体化的问题^①,到了夏天苏联更是全国“进入了全盘集体化阶段”^②,而所谓“全盘集体化,就是把全村所有的土

^① 参见《20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新经济政策是怎样被断送的》(五),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98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57页。

地转交集体农庄”^①。这样一来,怎样处置富农——是否允许他们加入集体农庄,如果不允许加入又把他们弄到哪里去——的问题便尖锐地提了出来,然而在这个问题上联共(布)中央却迟迟没有作出结论。

在1929年4月举行的联共(布)第16次代表会议上,代表们就是否允许富农加入集体农庄的问题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结果是,少数代表反对富农加入,多数代表主张有条件地允许富农加入。其中持后一种观点的斯摩棱斯克代表A·C·卡雷基娜这样论证道:“在那些拖拉机队能够耕种几千公顷土地、兼顾周围好多村庄的地方,在那些按照合同协议土地已经最终联合起来的一切经济组织中,毫无疑问,应当把富农留在集体农庄里。通过这种途径,事实上没收了富农的生产资料。因为这样一来,富农既没有什么人,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供剥削了。”她认为,只有那些刚成立的、经济力量薄弱的集体农庄才不应接收富农,以免他们篡夺集体农庄的领导权^②。全苏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主席卡明斯基也同样指出,由于拖拉机队和拖拉机站能够在全盘集体化的村庄控制和分解富农阶级,并迫使富农服从集体经济,所以在这些地方让富农加入集体农庄不会带来太大的危害^③。然而这次会议最终却没有在是否准许富农加入集体农庄的问题上形成决议,所以会后各地在这个问题上仍然采取了不同的做法:有的地区准许加入,有的地区则不准加入。

1929年7月18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中央全会对北高加索边疆区委农村工作报告决议执行情况的决定》对该边疆区拒绝富农加入集体农庄的做法作了肯定,明确表示:“中央同意北高加索边疆区委关于不宜接受富农加入集体农庄和必须不断进行工作把企图从内部瓦解集体农庄的富农分子清除出集体农庄的决定。”^④不过,中央政治局的这个决定只是肯定了北高加索的做法,表明了中央不赞成富农加入集体农庄的倾向,并没有硬性要求全国其他地区都要像北高加索那样,必须禁止富农加入集体农庄。因此这个决定作出之后,一些地区仍未对富农关闭大门,譬如在伏尔加河下游地区,直到1929年9月30日以前富农都是可以加入集体农庄的^⑤,而甚至到1929年11月上旬,在某些地方仍有“相当多烦琐的争

论:让还是不让富农参加集体农庄?”^⑥

就在人们就是否允许富农加入集体农庄的问题进行争论之时,富农的破坏活动却随着全盘集体化运动的开展而明显加剧。所以在1929年11月举行的专门研究全盘集体化问题的联共(布)中央全会上,人们纷纷揭露和控诉了富农破坏集体农庄运动的罪行。比如,卡明斯基在《关于集体农庄建设的总结和今后的任务》的报告中指出:“富农用两种方法向集体农庄进攻:包括暗杀、放火等直接反对集体农庄的形式和相反的形式——从内部‘破坏’集体农庄的形式。面对全盘集体化的事实,富农极力改变‘方针’,争取加入集体农庄。富农使用各种诡计混入集体农庄从内部进行破坏活动的大量事例是众所周知的。”^⑦柯秀尔讲道:“正是在农业的改造方面,我们将同富农进行最残酷的战斗……我可以举出一长串的事实说明富农在乌克兰农村进行恐怖活动的规模。恐怖活动比1927年增加了三倍。”^⑧施利希特尔则进一步补充道:“乌克兰的实践表明,如果一个集体农庄在这种或那种情况下没有完成粮食收购计划,那就可以完全深信不疑地说,这里有富农活动;如果一个集体农庄在瓦解,那同样可以完全深信不疑地说,这是富农或者富农帮手活动的结果,他们先加入集体农庄,然后又退出去,目的就是要搞垮这个集体农庄。”^⑨

在这样的会议气氛下,中央委员们在是否准许富农加入集体农庄问题上的观点同四月全会相比发生了明显变化:大多数人表示不准富农加入集体农庄,少数人表示现阶段不准富农加入,但将来在集体农庄巩固以后可以允许他们加入。其中持后一种态度的北高加索领导人安德烈耶夫这样讲道:为了不使第一阶段的集体化工作复杂化,应

①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34页。

② 陈之骅主编:《苏联史纲(1917~1937)》下册,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1~552页。

③ 同上,第552页。

④ 《20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新经济政策是怎样被断送的》(五),第739~740页注释321。

⑤ [苏]谢梅尔宁:《论消灭富农阶级》,载《苏共历史问题》1958年第4期。

⑥ 《20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新经济政策是怎样被断送的》(五),第139页。

⑦ 同上,第319页。

⑧ 同上,第430页。

⑨ 同上,第437页。

暂时不让富农加入集体农庄。“所以是暂时,因为我认为,当我们发展壮大,当我们能够保证我们的集体农庄取得决定性的成就,当我们狠狠地剥夺富农(因为我们不打算在肉体上消灭他们)之后,我们将不怕把这一部分居民也纳入我们的公有经济。”^①米高扬也谈道:“在大规模集体化的情况下,在集体农庄里存在斗争的情况下,在集体农庄建立的最初阶段,富农的加入是非常危险的。当我们把集体农庄牢牢地建立起来并且巩固了之后,我们也许会接收富农,因为我们总得把他们安置到什么地方。”^②

既然大家都认为不能让、至少是现阶段不能让富农加入集体农庄,那么将对他们、至少是现阶段将对他们作何处置,把他们弄到那里去呢?对此卡明斯基在报告中肯定了北高加索边疆区库班专区“十月”集体农庄的做法:先将富农的土地剥夺,然后把他们分别迁移到本村集体化土地之外的几个边角。卡明斯基还解释道,之所以把他们分别迁到几个边角,而不是迁到一个边角,“为的是不让他们凑在一堆”^③。

然而对于“十月”集体农庄的这种做法,有些中央委员却并不赞同。就在卡明斯基讲到该农庄把富农分别迁到农庄外的几个边角时,会场内有人高喊:“他们四面围着,这也危险。”^④就连该农庄所在地北高加索的领导人安德烈耶夫也承认:我们把富农划出去,迁到紧邻集体化土地的几个边角,“这还不意味着,他们将不再有影响,这还不意味着,他们已被万里长城隔开,将不会再对某些中农阶层发生一定的影响。富农虽然在经济上破了产,但并没有停止与我们的斗争,而且也不会停止。”^⑤那么,究竟把富农弄到哪里去对集体农庄来说才是真正安全的呢?对此与会的中央委员们谁也没有提出更进一步的建议。莫洛托夫在会上虽然宣称:“对富农应该怎么办的问题,我们必须回答。”但他的回答也仅仅是:“要把富农当作最凶恶的和尚未被彻底打倒的敌人对待”。至于怎样对待,他却并没有给出答案^⑥。

十一月全会所关注和讨论的另一紧迫问题,是在全盘集体化的条件下集体农庄建设的基金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大家主要谈了如下两点:第一,集体农庄基金决定着农业集体化的质量、速度与规模。第二,国家无力为全盘集体化投入大量的

资金,集体农庄的公共基金主要应靠吸收庄员的钱物来解决。关于这一点,卡明斯基在会上的报告和发言中强调:“认为大规模集体化可以用集体农庄建设初期的那种做法,即主要靠国家的投入进行,那将是极大的错误。”“难道只靠国家能够实现千百万农户规模的集体农庄建设?我们的集体农庄庄员应当明白,不动用居民本身的资金,集体农庄运动不可能有牢固的基础,集体农庄的建设必须依靠来自下面的物质资源。”^⑦莫洛托夫进一步阐释道:“国家的任何帮助要充分地保证大规模的集体农庄运动都是不可能的。归根结底,国家尽力给予的一切也只是区区小钱。国家必须把自己的主要资金继续用于发展工业……”^⑧米高扬甚至上纲称:“那些把希望寄托在国家的钱上,认为这是集体农庄运动基础的人,这是集体农庄运动的反对者,他们不相信集体农庄运动的力量和生命力并限制它的规模,他们不相信集体农庄会自己弄到钱。”^⑨

可是集体农庄自己又到哪里去弄到钱呢?允许加入集体农庄的贫雇农和中农的财产——正如莫洛托夫所说——“是少得可怜的,有时简直是寒碜的”^⑩,而拥有较多财产的富农又不允许其加入集体农庄。难道仅靠这样一些集体农庄庄员的财产构成的公共基金就能保证集体农庄的巩固和发展?难道能够允许富农在这样的集体农庄身边继续拥有自己的财产,并运用这些财产所获得的肯定较多的钱粮收入去显示他们个体经营的优越和富足?在这里,答案几乎可以脱口而出,但却无人说出答案。

为什么在究竟把富农弄到哪里去对集体农庄来说才是最为安全的问题上无人提出更进一步的建议,为什么在谈到主要利用农民的财产建立集体农庄基金时竟无人提及富农的财产呢?这是因为与会者在会上所发表的意见已经到了现行的限

① 《20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新经济政策是怎样被断送的》(五),第350页。

② 同上,第452页。

③ 同上,第319页。

④ 同上,第319页。

⑤ 同上,第355页。

⑥ 同上,第393页。

⑦ 同上,第402、312页。

⑧ 同上,第390页。

⑨ 同上,第453页。

⑩ 同上,第390页。

制富农剥削趋势政策的边界,只要他们再按着他们在发表这些意见时的思路和逻辑前进一步,那么就要突破现行政策的边界而改为别的政策了,而对于这样事关新经济政策行止的重大政策转变,是他们谁也不敢贸然提出的。然而他们的发言却把事情推到了这样的地步:如果不突破现行的富农政策的限制而对他们采取更进一步的措施,那么他们对集体农庄的威胁就仍然令人担忧,他们那份殷实的家产就到不了国家既无力支付、农庄自身又难以筹足的集体农庄基金的账户。

尽管如此,这次全会通过的决议对富农问题却讲得异常简略,它只是公开表示了不允许富农加入集体农庄的态度,而对被关在集体农庄大门之外的富农将采取何种措施的问题则只字未提^①。这表明,在这次全会上斯大林等联共(布)领导人已从与会者的发言中意识到了现行的富农政策与当前全盘集体化形势的不适应,但对于是否改变和如何改变富农政策、对于富农到底应该怎样处置的问题他们还没有考虑成熟,尚须根据这次全会上中央委员们的发言,由专门的机构进行研究,由另外的中央会议做出决议。

这次全会闭幕后半个月,1929年12月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成立了专门研究集体农庄建设问题的、以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雅科夫列夫为主席的“全盘集体化地区委员会”(通称“特设委员会”),特设委员会下设的以巴乌曼为主席的“富农问题小组委员会”专门用来研究全盘集体化地区的富农问题。不久该小组委员会搞出了一份题为《全盘集体化地区的集体农庄和富农》的提案。提案称,在全盘集体化的条件下,已不能停留在一般地不准富农加入集体农庄和从集体农庄中清除富农分子,生活已向我们提出了消灭富农阶级的问题。在全盘集体化地区应剥夺富农的全部财产,并把它作为不可分割的集体农庄基金。提案建议,把富农划作三类,分别处置:第一类为积极反抗社会主义秩序和从事反革命破坏活动的富农——将其逮捕或驱逐到苏联的边远地区;第二类为拒绝服从全盘集体化秩序的富农——将其迁到本州(区)之外;第三类为其余大多数服从苏维埃政权和不反对集体化措施的富农——允许其加入集体农庄,但在3~5年的时间内须剥夺他们的选举权^②。雅科夫列夫特设委员会在对该提案

核准后,于12月25日将其作为特设委员会起草的中央决议草案提交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讨论。斯大林对该草案中关于剥夺富农财产,消灭富农阶级,逮捕或迁移富农成员的精神持肯定态度,但却不同意草案中关于大部分富农可以有条件地加入集体农庄的提法,遂以“决议草案尚不成熟”为由,要求推迟讨论^③。

两天后——12月27日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上发表的演说中指出,要从限制富农剥削趋势的政策转向“把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来消灭的政策”;“剥夺富农财产是建立和发展集体农庄的一个组成部分”。他宣称:“我们所以采取新经济政策,就是因为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当它不再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抛开。”在关于是否可以让富农(即使一部分富农)加入集体农庄的问题上,斯大林斩钉截铁地答道:“当然不能让他们加入集体农庄。所以不能,是因为他们是集体农庄运动的死敌。”^④12月29日,斯大林把他的这篇演说公开发表在了《真理报》上。

在这里笔者想指出以下三点:第一,我们原先曾一直说是斯大林首先提出、突然提出了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而从上面的论述中不难看出,首先提出这一政策的并非是斯大林,而是巴乌曼小组委员会,但首先对这一政策作了理论论证并首先将其诉之公众的却是斯大林;而不论是巴乌曼小组委员会还是斯大林,与其说他们是在整个中央领导集体都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突然提出了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不如说他们是在十一月中央全会的启发和推动下才提出了这一政策。第二,巴乌曼小组委员会提出的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和斯大林提出的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在内容上并不完全相同,其中前者允许大多数被剥夺了财产的富农加入集体农庄,后者则不允许任何富农加入集体农庄。第三,斯大林在这篇演说中所讲的不许富农加入集体农庄同十一月全会及其全会之前

^① 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四分册,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7~99页。

^② 陈之骅主编:《苏联史纲(1917~1937)》下册,第554页;〔苏〕罗·亚·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7~158页。

^③ 陈之骅主编:《苏联史纲(1917~1937)》下册,第554页。

^④ 〔苏〕《真理报》1929年12月29日。

所讲的不许富农加入集体农庄的含义是不同的：十一月全会及其此前所讲的不许富农加入集体农庄，是指让仍握有自己财产的富农处在集体农庄之外，斯大林在这篇演说中所讲的不许富农加入集体农庄，则是指让已被剥夺了财产的富农处在集体农庄之外。

在斯大林的演说发表后不久，1930年1月1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成立了以莫洛托夫为首的富农问题专门委员会，该委员会根据斯大林的立场和莫洛托夫关于“把富农当作最凶恶的和尚未被彻底打倒的敌人对待”的态度，对雅科夫列夫特设委员会提交的中央决议草案进行了重大修改，从而形成了新的中央决议草案。1月30日，中央政治局根据这一草案做出了《关于迁移被没收了财产的富农的决议》。

决议指出：“从消灭富农这一阶级的政策出发，必须相应地用最组织的方法在全盘集体化地区实行已开始的消灭富农经济的过程”，“没收这些地区富农的生产资料、牲口、生产和生活用的建筑物、加工企业、饲料及种子的储备”。“被没收的富农的生产资料和财产由区执行委员会转交给集体农庄作为贫农及雇农的经费，列入集体农庄的不可分割的基金。”

决议还指出：“为了彻底粉碎富农对贫农及中农部分阶层的影响和绝对地镇压来自富农方面对苏维埃政权和集体农庄实行的措施的反革命抵抗”，应对富农按其类别分别采取以下措施：第一类为反革命的富农活跃分子——立即将其关进集中营；第二类为富农活跃分子的其余部分，尤其是大富农和半地主——将其驱逐到苏联边远的地方和该边疆区内的遥远的地方；第三类为在各区范围内留下来的富农——把他们移民到本区集体农庄范围以外新拨给他们的地段上。

值得注意的是，按照该决议，必须被关进集中营和必须被立即驱逐的只应分别是第一类（6万人）和第二类（15万人）富农分子，而不是这两类富农分子的整个家庭：“被驱逐及关进集中营的富农的家属在本人自愿并得到各地方执行委员会同意时可以临时留下或永远留在原来的区（专区）”。决议要求，应在4个月（2~5月）内完成对这两类富农分子采取的措施^①。

2月1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

会又做出了《关于加强全盘集体化地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与富农斗争》的决议，从立法程序上确认了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随后，剥夺和迁移富农的运动在全盘集体化地区轰轰烈烈地展开。

二 迁移对象的扩大化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30年1月30日决议在部署对富农的剥夺与迁移时，曾预见到了在这一运动中所可能出现的偏向和过火行为，因而特意指出：“三类中被消灭的富农户的每一类的数量应当按区、按照每个地区富农户的实际情况严格划分，其目的是为了在所有主要区被消灭的富农户总数是平均的，约为3%~5%。本指标（3%~5%）的目的是为了集中打击真正的富农户并绝对防止这些措施扩大到任何中农户。”“红军战士及工农红军指挥员的（富农）家属不应被迁移，财产不应被没收。对长期在工厂工作的富农的家属要持特别慎重的态度。”“中央对某些地区用赤裸裸地没收富农财产的做法偷换大规模集体化工作的事实坚决地提出警告”^②。

然而从1930年2月下半月开始，消灭富农阶级运动中的偏向和过火行为还是越来越严重地出现了，这表现在：第一，相当数量的中农甚至贫农被划作了富农，从而使被剥夺的农户大大超过了中央决议确定的比例。如上所述，中央确定的富农户比例大致在3%~5%之间，但在某些地区这一比例竟被弄到了15%以上^③，而剥夺对象的扩大化必然会导致迁移对象的扩大化；第二，在富农户中，大大提高了第一和第二类富农所占的比例，从而大大突破了中央所确定的前两类富农的比例数。按照1930年2月4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给各地苏维埃的电报指示，属于第一类的富农户约6万户，第二类约15万户，第三类约80万户^④。这也就是说，在总计约101万户富农中，第一类接近占6%，第二类接近占15%，第三类接近占80%，但伏尔加河中游地区在所划作

^①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5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00、601、602、604页。

^② 同上，第601、604页。

^③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四分册，第117页。

^④ 陈之骅主编：《苏联史纲（1917~1937）》下册，第556页。

的富农户中,各类富农所占的比例却是:第一类12%,第二类40%,第三类48%。个别地方被划作第一和第二类富农的农户竟占到了农户总数的15%~20%^①。而1930年4月4日一位名叫格尔曼的被驱逐者在被驱逐地写给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的一份申诉书中甚至这样讲道:“我们的村苏维埃由于听信谗言,把50%的人驱逐了”,“从博布鲁伊斯克驱逐的1500户人家中50%是无辜的受害者”^②。第三,一些家里有人参加红军的富农户也列入了被剥夺和被迁者当中^③。

那么为何会出现上述的偏向和过火行为呢?其主要原因是:第一,由于各地领导都想在全盘集体化运动中走在前头,争当先进,因而都拼命加快了本地集体化的速度。据统计,1930年1月20日全国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户只有21.6%,到3月1日则迅猛增加到了56%^④。而为了加快集体化的速度各地便不惜违背农民的自愿原则,采取逼迫、强制的手段。不少地区提出的口号是:“谁不加入集体农庄,谁就是富农。”这样一来,那些抵制集体化运动、不愿加入集体农庄的中农甚至贫农自然就被划作富农之列了。第二,长期以来苏联党和政府对什么是富农户一直没有做出一个权威的界定,正如苏联《计划经济》1929年第8期上的一篇文章所说:“甚至区别富农与中农和中农与贫农的标准这样一个基本问题,还没有得出一个权威的结论。”1930年1月30日中央政治局关于剥夺和迁移富农的决议也没有给出这样的结论:它既没有对什么样的农户算作富农作出说明,也没有对各类富农的区分作出清晰的界定。所谓“反革命的富农活跃分子”、“富农活跃分子的其余部分”的笼统种类划分,让人在实际工作中极难把握和操作。于是许多中农乃至贫农便以各种莫名其妙的原因被划作了富农,甚至被强迫迁移。譬如曾经卖给过别人农具或粮食、对上级的政策进行过抱怨、家里曾有人蹲过监狱、没有按时完成粮食交售定额,与村干部有个人恩怨等等^⑤。正如北德文斯克247名被迁移者在给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信中所写的那样:“不加区分地强迫我们搬迁,同时不考虑每一个农户的财产状况。”^⑥第三,由于一方面富农的迁移可以为本地腾出土地,另一方面按照中央文件的规定,富农的财产被

剥夺后大部分充作集体农庄的基金(到1930年夏从富农手里剥夺的财产占到了全国集体农庄基金的34.4%^⑦),小部分用来偿还富农的债务和分给贫农,所以无论是地方领导、集体农庄干部和庄员,还是尚未加入集体农庄的贫农,都在剥夺和迁移富农方面表现出了极大的积极性,都希望尽可能快和尽可能多地剥夺和迁移富农。比如,伏尔加河中游地区还在中央政治局1930年1月30日决议做出之前就已闻风而动,于1月20日做出了关于剥夺和迁移本地富农的决定。而作为莫洛托夫委员会成员之一的瓦莱斯基则在《真理报》上这样讲到了贫农们的积极性:“贫农成群结队地同委员会一起去没收牲畜和财产。晚上,他们主动守在村口路边,扣住逃跑的富农。”^⑧

消灭富农阶级运动中的上述偏向和过火行为,很快引起了联共(布)中央领导人的重视。加里宁和奥尔忠尼启则在1930年2月联共(布)中央召开的俄罗斯和乌克兰党组织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同年3月2日斯大林发表在《真理报》上的《胜利冲昏头脑》一文,都对这些偏向和行为提出了批评。随后联共(布)中央又于3月14日做出了《关于反对歪曲党在集体化运动中的路线》的决议,决议一方面强调绝不能将针对各类富农的镇压措施强加到中农甚至贫农头上,另一方面又要求对所划作的各类镇压对象进行审查和甄别,对错划者予以平反^⑨。而这一决议也得到了较好的贯彻执行,不少地方从原来划作的富农户中恢复为中农和贫农的竟达一半以上,个别地方甚至达到了90%以上^⑩。但令人遗憾的是,无论联共(布)中央的这一正确立场,还是各级地方党组织

① [苏]罗·亚·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第160页。

②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70、71页。

③ [苏]罗·亚·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第161页;《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78页。

④ [苏]萨姆索诺夫主编:《苏联简史》第二卷上册,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335~336页。

⑤ [苏]罗·亚·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第160页;《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85、92页。

⑥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92页。

⑦ 陈之骅主编:《苏联史纲(1917~1937)》下册,第560页。

⑧ [苏]爱德华·拉津斯基:《斯大林传》,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年版,第162页。

⑨ 参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四分册,第117~119页。

⑩ [苏]《布尔什维克》1930年第6期。

在这个问题上对中央决议的认真态度——正如从下面的叙述中我们会看到的那样——都没有始终如一地坚持下去。

虽然按照中央政治局 1930 年 1 月 30 日决议, 必须被关进集中营和迁移到边远地区的只分别是第一类和第二类的富农分子, 他们的家属在本人自愿并得到当地政府同意的情况下, 可以临时或永久地留在原来的地区, 但实际上从一开始第一类富农分子的家属和第二类富农分子与家属就在联共(布)中央的容许下一并遭到了迁移, 而 1930 年夏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关于特别村的决议》不仅对此做法作了肯定, 而且还提出了这样的要求^①。由于这个原因, 也由于迁移和安置工作远比预料的复杂, 所以迁移工作自然不可能在原定的 1930 年 5 月份结束。不过到 1931 年年中, 苏联政府所说的第一类(6 万)和第二类(15 万)共计 21 万户的富农就被迁移完毕了。

这个时候联共(布)中央无疑应该断然宣布迁移工作的停止, 可是 1931 年 7 月 20 日中央政治局做出的《关于富农问题》的决议, 却只是宣布“大规模地迁移富农的任务已基本完成”, 要求今后不是停止对富农的迁移, 而是迁移的方式要由大规模的迁移改为“个别进行”的迁移^②。

根据 1931 年年底呈送给中央富农事务委员会主席安·安·安德列耶夫的资料, “(1) 1930 年共迁出: 113 013 户, 551 330 人; (2) 1931 年共迁出: 243 531 户, 1 128 198 人。1930 年和 1931 年共计迁出 356 544 户, 1 679 528 人。”^③从 1931 年 1 月到 7、8 月份, 所迁数目从最少说也不会低于本年度所迁 243 531 户的一半, 即使按照一半计算, 那么从 1930 年年初到 1931 年 7、8 月份所迁数目也达到了 234 779 户。这就是说, 原中央确定的 21 万户应迁富农不仅已被迁移殆尽, 而且还比那个数目多出了数万户。那么今后应“个别”迁移的“富农户”, 该是什么样的“富农户”呢? 对此, 上述 7 月 20 日的政治局决议只字未提, 下述 1931 年 8 月 30 日的政治局《关于今后迁移富农的办法的指示》则作了这样的表述: “今后迁移富农户, 要在他们暴露后……用个别的方法小批地进行迁移”, “要根据暴露的情况用个别的方法进行”; 同时, “今后迁移富农户时, 应最大限度地保证进行最严格的审查和认真地进行阶级的筛选, 目的是把

真正的富农分子迁移出去。”但也不是凡是“真正的”富农户都要迁移, 而是只有“其成员中有劳动能力的男子的那些富农户才应迁移”^④。

根据这些表述, 今后的迁移对象似应同时符合以下三个条件: 第一, “真正的”富农户; 第二, 因反动言论或破坏行为而被揪出来(即所谓“暴露”出来)的富农户; 第三, 其家庭成员中有劳动能力的男子的富农户。

由于这个《指示》对今后的迁移对象既无规定限额, 又讲得有些模糊; 由于各地一直热衷于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和强制的方法来完成、提前完成和超额完成上级布置的各项任务和下达的各种指标, 也由于边疆地区的各类企业和这些企业的主管部门不断向中央提出将更多的农户迁来做他们的劳动力的请求, 大规模的迁移工作在这个《指示》发布之后并未停止, 而迁移对象则由被揪出来的富农越来越变成了因犯有各种过失而被揪出来的集体农庄庄员和尚未加入集体农庄的中农与贫农^⑤。然而直到 1933 年 5 月 8 日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在其联合做出的《关于移民问题对全体工作人员及有关机构的指示》中才对这一大规模迁移农户的行为进行了制止。

5 月 8 日的《指示》说: “由于我们在农村的成就, 我们不再需要大镇压的时刻已经到来, 众所周知, 大镇压不仅伤害了富农, 也伤害了个体农户和部分集体农庄庄员。确实, 一些州还在继续要求从农村大规模地迁出农户并采取激烈的镇压方式。中央和人民委员会收到的申请中, 要求立即从州和边区强迫迁出的农户近 10 万户。从中央和人民委员会掌握的资料可以看出, 农村中大规模的随便逮捕人的现象, 仍然存在于我们的工作人员的实践中。”

①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12 卷, 第 72 页。

②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15 卷, 第 625 页。

③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4 卷,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 第 413 页。

④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15 卷, 第 645~646 页。

⑤ 苏联著名作家米·肖洛霍夫在 1933 年 4~5 月与斯大林的通信中多次谈到了这种情况, 譬如他在 4 月 16 日的信中写道: “那些偷了集体农庄粮食或没有完成交粮指标的人, 不仅被开除了集体农庄, 而且还被‘赶出了家园’;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下属的区分局为了加快粮食收购进度, 急急忙忙地开始挖反革命分子’, 北高加索边疆区韦申斯卡亚区只有 13 813 家农户, 而仅在这个区‘因粮食问题被判刑的就有 1 700 人左右。现在他们的家人都被迁到了北方。’”(《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15 卷, 第 692、677 页。)

《指示》要求：“立即停止各种大规模强迫迁移农民的做法。强迫迁出只能是个别的，部分的，并且只针对其成员积极反对集体农庄及组织、抗拒播种和粮食征购的那些农户。”《指示》分别为各地区规定了迁出农户的最高限量，而全国的最高限量是12 000户^①。

对比上述1931年8月30日的《指示》和1933年5月8日的《指示》不难看出，前者要求的是停止大规模地迁移、只允许个别地迁移“富农户”，后者要求的是停止大规模地迁移、只允许个

别地迁移“农民”、“农户”。可见，就苏联共（布）中央也认为，在这两个《指示》之间长达近两年的时间里各地仍在大规模迁移的，大部分已是并非富农的农户了。

在1933年5月8日的《指示》做出之时，全盘集体化运动已经结束^②。然而大规模迁移农户的行动却没有因全盘集体化运动的结束和这个《指示》的作出而停止，而是伴随着接踵而至的肃反运动一直持续到了卫国战争爆发前夕的1940年。下面是1932~1940年间各年的迁移人数^③：

年份	1932	1933	1934	1935	1936	1937	1938	1939	1940
迁移人数	201 502	398 407	254 997	246 194	164 902	128 047	424 565	220 699	137 278

1940年之后对农户的大规模迁移虽然停息下来了，但零星的（有时是小规模的）迁移却断断续续地持续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

根据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作出以下两点总结或者说结论：

第一，在迁移对象和迁移目的方面，联共（布）中央原定的对第二类富农分子的迁移在直接变成对第一类富农分子的家属和第二类富农户的迁移后，又逐步演变成了对因犯有各种过失而被揪出来的第三类富农户、非富农户和集体农庄庄员的迁移，而所有这些被迁移者却都被冠以“富农”移民的名号；迁移的目的从消除第一和第二类富农对集体农庄的威胁，逐步演变成了对犯有各种过失的第三类富农户、非富农户、集体农庄庄员的惩罚和满足边疆地区对劳动力的需要。

第二，在迁移数量方面，须分清1930~1932年全盘集体化时期的迁移数和从1930年至20世纪50年代初的总的迁移数。如果对这两者不加区分而笼统地讲迁移数量，那么必会因不同资料实际所指的年限不同而出现很大的差别。关于全盘集体化时期的迁移数，根据前面提到的1931年年底呈送给安德列耶夫的资料，1930年和1931年共计迁出356 544户，1 679 528人（平均每户约为4.7人），再根据上表中所列的1932年迁出201 502人（按平均每户4.7人计算，约合42 873户），那么全盘集体化时期的迁移数应为1 881 030人，约合399 417户。莫洛托夫在他90岁生日时曾回忆道：“我们的集体化搞得不错……我亲自划定了驱逐富农的地区。共驱逐了

40万户。”^④他在这里所说的40万户应该指的就是全盘集体化时期的驱逐数，而如果他确实指的就是这个时期，那么很显然他的说法是正确的。至于从1930年至20世纪50年代初的总的迁移数，由于这期间令人信服的权威资料难以收集齐全，所以也就很难统计出来了。不过根据上文已列出的有关数字计算，从1930年到卫国战争之前的1940年，共迁移农民人数为2 176 591人，按每户平均4.7人计算，约为82万户。

三 被迁农户的命运

为了强迫富农迁移，随时镇压可能出现的反抗，联共（布）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都作了比较充分的准备。1930年1月30日中央政治局决议授权担负主要迁移任务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法庭外全权审理有关富农迁移的案件，并要求增加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经费预算和扩大其特派员与兵员的编制，此外决议还要求从各工业州动员2 500名党员去帮助开展各地的富农迁移运动^⑤。1930年2月6日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党委为实施迁移向各区党委发出了“进入战备状态”的通知，要求各区为执行该任务而建立的“党员支队”必须“具

①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175、177~178页。

② “全盘集体化运动”于1932年结束。这一年被宣布为“完成全盘集体化的年份”。参见陈之骅、吴恩远、马龙闪主编《苏联兴亡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4页。

③ 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国家档案馆，9479全宗，第1目录，第89卷宗，第205、216页。

④ [苏]爱德华·拉津斯基：《斯大林传》，第163页。

⑤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5卷，第605~606页。

有无可争议的战斗”，“都能适应行军打仗”；同时，“必须检查党员支队人传通信联络的通知系统是否可靠，能否保证支队成员在做好充分战斗准备的情况下快速集结”；“党员支队将按照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指示，在支队指挥员指挥下行动。”^①

在武力威逼下被迫作为特殊移民走上迁移之途的富农们，其迁移过程是极为悲惨的。在1930年写给加里宁的反映移民情况的众多信件中，有两封这样写道：“是这样把他们迁出的：把男人们投入监狱，而他们的家属和孩子在零下50度严寒中被赶到街上，甚至连孩子也不让进屋。把所有东西都抢光，甚至连孩子的襁褓也夺去。今年3月14日夜下令让他们一个小时内上路。”^②“在可怕的严寒中打发他们上路——吃奶的婴儿和孕妇，他们一个挨一个地挤在货车车厢里，就在那里孕妇生下自己的孩子（这不是侮辱人吗）；然后像扔狗一样把孩子扔出车厢……”“要知道大家都是人，为什么对待他们比对狼崽子还坏？”^③

按照1930年夏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关于特别村的决议》，移民在到达迁入地后都要住进专门为他们建立的特别村，然而当移民潮水般地涌向迁入地时，这样的特别村却没有建立起来，于是只好把从火车站涌出的移民临时安置到车站附近的教堂中和车站附近森林里正在搭建的板棚中，甚至直接把他们“丢弃在露天旷野里”^④。这些聚居在火车站周围的移民们或者被派去从事各种短期的或长期的繁重劳动，或者被扔在那里无人过问，既不给工作干，也不给食物吃^⑤。疾病和死亡随之包围了各个移民聚居地。当时被暂时安置在沃洛格达火车站周围的一批移民在给加里宁的信中写道：我们所住的教堂搭了三层高的铺板床，“我们大家都病了，而14岁以下的儿童像成群的苍蝇那样死去，对这么大量的病人也没有医疗救护。在一个半月里就在沃洛格达公墓里埋葬了近3000名儿童。”^⑥

随着时间的推移，移民们终于住进了为他们设立的“特别村”，那么在这之后他们的境况又如何呢？下面是1931年3月8日乌拉尔警卫司令部司令员巴拉诺夫和5月13日巴拉诺夫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乌拉尔站作战处侦缉员基留欣所报告的有关乌拉尔州移民的情况：

1. 住房情况：截止1931年2月乌拉尔州共有移民31851户，134421人。已建成居住区115个，小木房6213个，可容纳18639户，计74556人，入居移民人均占有0.91平方米。房内取暖设备不足，且潮湿而又拥挤，除睡铺外几乎没有任何余地；而其余的13212户计59865人因无小木房可住，只好安置在劳动地点附近的村庄里，与当地居民住在一起。

2. 子女受教育情况：特殊移民的学龄儿童总数为20955人，其中在学的占15.55%，不在学的占84.45%。

3. 供应情况：对移民粮食和工业品的拨付屡屡中断，若干地区几个月完全没有煤油、食盐，不供应肥皂和植物油，蔬菜只是偶尔才有。“在供应定额本来就极其有限的情况下，上述中断一般都导致浮肿和坏血病日益严重，儿童居民死亡率增高，疥疮频繁发生等等。”

4. 劳动情况：移民的生产定额比雇佣工人高50%，工资（按所挣卢布折算成的粮食）则按正常工资的75%发给（根据1930年5月6日苏联人民委员会的决定，移民工资的25%充作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机关的基金）。由于生产定额过高，加上工作服没有保障，所以从事木材采伐的移民（占乌拉尔州全部移民劳动力的近一半）无法完成这个定额，因而也“不能得到全份粮食，每天的粮食定量要减少50%甚至75%。”超负荷的劳动和饥饿使从事木材采伐的移民越来越多地丧失了劳动能力，木材采运企业也因此无法完成采运计划，于是他们决定让本企业从事木材采伐的移民的家属，不分性别和年龄全部参加木材采伐，“就连12岁的儿童和老人也确定了每日2~2.5立方米的生产定额，而对成年工人所定的生产指标……平均也不过是每天3立方米。因此，为了完成生产定额，特殊移民经常留在森林中整日整夜地劳动，往往冻坏冻僵，大批移民得病……到木材采伐快要结束时，（人们）已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多数人成了残废。”

①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4卷，第407~408页。

②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84页。

③ 同上，第98、99页。

④ 同上，第89页。

⑤ 同上，第104页。

⑥ 同上，第82页。

5. 对移民的虐待。由于移民属于专政对象,而某些人又把消灭富农阶级误认为在肉体上消灭富农,所以这些人对移民的做法可谓肆无忌惮,无法无天:木材采运企业的工长、工作队长和警卫队长常常毫无因由地把不同年龄的移民关进囚禁间,“要他们在没有取暖设备的屋子里脱光衣服,连续呆几个昼夜不让吃饭。”“移民们在这些拘留室里、在自己家里、在街上、在森林中干活甚至休息时都遭到毒打。妇女和少女同样挨打,还被强奸和玩弄。”甚至还有把移民装进棺材准备活埋、把移民抛入水中和篝火中的事件发生。上述的报告写道:“所有这些无缘无故的侮辱,归根到底是要在肉体上消灭特殊移民……例如,党员工作大队长拉图什尼亚克毒打一个移民时嚷道:‘你们都得斩尽杀绝,杀了你们马上就再送八万。’”^①

各地对移民安置、劳动使用的落后和混乱状况以及移民遭受虐待、不断丧失劳动能力和死亡的情形,引起了联共(布)中央的关注。1931年5月15日中央富农事务委员会会议决定,把有关移民的经济、行政及组织管理工作完全交给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机关,这些机关在向各经济部门提供移民劳动力时,后者必须对到本部门工作的移民的住房条件、合理使用、工资待遇和医疗保健等方面作出承诺,并同前者签订合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各机关对今后违反合同的有关人员要最严厉地追究其责任”^②。但是各使用移民劳动的部门和企业并未因为这一决定而对移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作出改善。于是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不得不亲自出面干预,并于1931年8月2日做出了关于改善移民生产和生活条件的专门决议。

决议一上来就对大量使用移民劳动的林业部门提出了批评,指出:“根据一系列材料及资料可以断定,在乌拉尔、北方边疆区、西西伯利亚和东西伯利亚的林业工业方面,无论是生产业务上利用特殊移民,还是对特殊移民的安置及住房、供应、应付工资的保障都存在完全不能容许的情况,这种情况完全是由于全苏木材加工工业联合公司及其州的和边疆区的托拉斯漠不关心造成的,他们不仅没有对此事给予必要的关心,而且甚至没有进行任何的考虑。”决议还对相关林业公司的负责人进行了点名谴责和严厉警告,对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有关地方机构和移民迁入地区的党委

在移民方面的工作表示了不满,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要求和改进措施,其中包括:移民的生产定额、在医疗服务和劳动保护中的待遇与雇佣工人相同;消除拖欠移民工资的现象,从移民工资中扣作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机关基金的比例由25%降至15%;限期解决移民的永久性住房;制定合理的移民粮食和生活用品供应标准,并保证供应;拨给移民家庭一定数量的生活用地、小型农具和家畜,帮助他们从事手工业劳动,以便他们在当地安心而稳定地居住下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中央监察委员会等机关经常派出代表,对各经济部门和企业使用和安置移民的情况进行检查与监督^③。

一个星期后——8月1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再次做出了关于改善移民生产和生活条件的决议。该决议除重申和细化了8月2日决议中已提出的一些措施外,还规定:(1)在各经济部门劳动的移民可以盖个人住房,各有关机构应在提供贷款和建筑材料方面给移民盖房以帮助,而“这个决定并不免除经济部门的负责人员保证向在他们那里劳动的特殊移民提供永久性住房的义务”。(2)在各经济部门劳动的移民,其工资、粮食和工业品供应标准、住房条件与雇佣工人相同,并享受与后者平等的社会保险制度。(3)依照年龄将移民中父母双亡的孤儿分别转交卫生和教育部门抚养;将没有劳动能力和没有亲人帮助的移民中的老人收进残疾人收容所。(4)允许移民加入消费和生产合作社,但须将他们作为消极社员对待,且他们不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5)移民中年满18岁的青年在5年期满且有良好表现的情况下,经有关部门批准可以恢复权利,而如果他们表现突出则可提前恢复权利并从移民村解脱出来。(6)为移民村组织定期的邮政通讯联系,把信件、汇款、邮包及订阅的报刊送到移民手中^④。

然而,由于移民低人一等的特殊政治身份,也由于各使用移民劳动的部门和企业都想尽量提高自己的经济效益而最大限度地攫取移民的剩余价

①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107~110、118~120页。

②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5卷,第616、617页。

③ 同上,第627~633页。

④ 同上,第635~642页。

值,所以他们对改善移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都采取了敷衍糊弄的态度,联共(布)中央的上述决议均未得到认真的贯彻实施。1932年年初乌拉尔州卫生局在向苏联卫生人民委员部报告本州移民的卫生状况时写道:“现时特殊移民的居住面积一般为(人均)0.5~1.5平方米”,其所居住的棚舍和小木房一般都是通铺,因铺位不够而在铺下睡觉已是常事,里面不仅喧闹不已,而且像是堆满了破烂的大仓库,汗味刺鼻,臭气熏天。低劣的居住和饮食条件造成了移民的大量死亡,比如在新利亚利亚区,一年中出生87人,死亡347人;在彼尔姆“K”联合工厂,“两个月中死亡的儿童占全部儿童的30%”^①。

于是1932年1月28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又一次做出了《关于特殊移民》的决议。决议气愤地指出:“由于经济部门没有建设必要的住房和辅助设施”,移民的食物不足且质量很差,也由于卫生保健部门没有为移民提供令人满意的服务,导致在一系列移民点发生了大范围的传染病,传染病患病率的增加和所有移民对荒无人烟地区严寒的不适应导致了死亡率的大大提高。“年幼儿童(8岁以下)的死亡率尤其高,在某些边疆区死亡率在1个月内达到儿童总数的10%。”^②为了克服这种状况,决议作出了如下指示:(1)在边疆地区建立由各方面代表组成的专门委员会来负责消灭传染病;(2)责成使用移民劳动的各人民委员部和经济联合体的领导人在本年4月1日前完成移民的住宅建设,保证他们按家庭居住且不得少于每人3平方米的规定标准,同时在这期限前组织好必要的卫生保健设施;(3)责成边疆区(州)和民族共和国的党委会“检查特殊移民的住宅、辅助性设施的建设和卫生设施最低要求的配备的执行情况,对没有令人满意地按期完成上述的建设任务的各经济联合体及地方机关的领导人要追究党纪和司法责任”;(4)责成卫生人民委员部在规定期限内向移民地区调派必要数量的医生和流动消毒室,并在那里建立较多的医疗分支网点;(5)从移民工资中扣作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机关基金的比例由15%降至5%^③。

上述指示不谓不具体和严密,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对它的这些指示能否得到执行却仍充满了疑虑,于是它于2月3日又做出了一个《关于特

殊移民》的决议,该决议一方面对各部门无视中央的三令五申,迟迟不能解决好移民生产和生活条件的状况进行了强烈谴责,并强调了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各人民委员部及经济机关都收到了关于使用和安置特殊移民程序的完全明确的指示。尽管如此,但是有一些人民委员部和个别经济机关要么根本不执行中央的有关决定,要么不完全执行这些决定。”而“妥善周密地安置并使用特殊移民的工作关系着尽快地解决开发苏联一系列荒无人烟地区的问题”,关系着那里能否有可用的“劳动力问题”。另一方面该决议又对各有关系人民委员部及经济联合体一一作了点名批评,并一一为他们规定了须限期完成的任务^④。

可是,1932年年初的这些决议还是没有得到认真的贯彻执行,移民的处境依旧非常艰难。在为表现突出的移民青年提前恢复权利方面,1932年8月22日一位名叫费多西·洛博达的移民在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中反映说,他所在的乌拉尔州纳杰日金斯克区只为11个人恢复了选举权,“难道全区只找得出11个好工人?我们的伐木点甚至一个都没有。而这个伐木点有3个移民村。”^⑤在使用移民劳动、安排移民生活和对待移民的态度方面,1932年冬俄联邦司法人民委员部负责人克雷连科在致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信中这样写道:“(1)特殊移民劳动力的投入、分配和使用进行得无计划并没有进行适当的考虑……各生产部门和工业部门使用特殊移民的劳动杂乱无章。(2)住房建设进行得十分缓慢,移民冬天住在十分拥挤的夏季营房、过去的教堂、公共澡堂、窝棚、土窖和帐篷里,住处不卫生的状况几乎是普遍现象。(3)供应移民食物和日用工业品的情况很差。(4)医疗和教育工作糟糕极了。(5)在某些地方到目前为止,管理特殊移民的行政人员有恣意专横行为,发生过毒打、无故逮捕、强奸和杀人事件。”^⑥1933年3月31日纳杰日金斯克区委书记日丹诺夫在就本区的移民情况给其上司的信中也写道:“(1)在整个1932年期间,对

①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162~163页。

②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5卷,第653~654页。

③ 同上,第654~657页。

④ 同上,第659~660页。

⑤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166页。

⑥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168页。

待特殊移民的态度确实是野蛮的,不能容忍的。仅仅1932年就有1万人死亡和6500人开小差这一事实,就足以明显地说明这一点。(2)1932年下半年食品经常运不到,导致人们极度虚弱。(3)住房建筑迄今处于极坏的状态(窗框往往没有玻璃,房子四面透风,经常没有炉火)。”^①

那么在这之后这些移民的命运又如何呢?反映他们在这之后命运的资料就很难见到了。直到卫国战争时期苏联对几个少数民族也实施了迁移,我们从集中介绍这类新移民的资料中,才零星地找到了以下几条反映当时“富农”移民境况的资料:

1. 1944年9月5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殊移民局局长库兹涅佐夫《关于特殊移民局的工作报告》说:与卫国战争期间的少数民族移民相比,“安排得最妥善的是从前的富农。其中大部分人安置在特居区内,有自己的房屋、院内建筑、牲畜和农具,他们的家庭在物质上得到保障,没有特别的贫困。”“有60000名从前的富农被动员参加红军。”^②

2. 一份标明写于1949年的《关于第一批迁到特殊移民区的移民资料(1948~1949年)》称,经清查,在特殊移民区现有“过去的富农”719122人;根据政府的决议,1941~1948年间有810614名“过去的富农”“被解除特殊移民身份”^③。

3. 根据1951年7月28日苏联内务部3局4处处长库罗奇金对特殊移民出生和死亡情况的统计,“过去的富农”1945年出生1691人,死亡8794人;1946年出生6269人,死亡5980人;1947年出生2826人,死亡3216人;1948年出生1165人,死亡1980人;1949年出生1079人,死亡1450人;1950年出生357人,死亡734人。1945~1950年共计出生13405人,死亡21554人^④。

4. 1951年12月31日,乌兹别克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毛希丁诺夫在致马林科夫的信中写道:

在1931~1933年农业集体化时期,被没收财产的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富农分子,继续在移民区居住,并予以特别登记……在移民区生活的岁月里,这些过去的富农分子在这里已置办了家业。许多人已成为集体农庄庄员或国营农场的工人。

为了执行苏联政府的决议及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和苏联总检察长的命令,苏联国家安全部机关逐步解除了对这些过去富农分子的种种限制,不再进行特别登记。

凡年满16岁的原富农子女,老龄富农及被医疗机关证明为残疾人的富农分子,如其家中没有有劳动能力的成员或亲属在特殊移民区的;凡其家庭的一个成员现在在苏联军队服役或曾在苏军服过役并且是伟大卫国战争的参加者的富农分子,均属应解除限制这一类人。

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请您允许取消上述人员的特殊移民登记并解除对他们的特殊移民的限制^⑤。

5. 1953年4月10日,苏联内务部特殊移民局局长希扬在《关于特殊移民局工作的报告》中讲:“具有劳动能力的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535742名特殊移民中”,“过去的富农分子”为20073名,占其具有劳动能力者的30.3%^⑥。

从以上这些零星的资料中,我们可以作出以下两点判断:

第一,到卫国战争时期,被迁农户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已有了较大改善,但比之普通的苏联居民仍有不小的差距,直到1950年他们的死亡数仍高于出生数(只有1946年例外)。

第二,卫国战争爆发后加大了恢复被迁农户政治权利的力度,他们不仅可以参军,而且仅在1941~1948年期间就有80余万人被解除了特殊移民身份。1948年后解除这些人特殊移民身份的工作仍在继续,但直到斯大林去世后的1953年4月他们中的一些人仍背负着这种身份。

(责任编辑 向祖文)

① 同上,第169页。

② 同上,第496页。

③ 同上,第538页。

④ 见上,第558~560页。

⑤ 同上,第561~562页。

⑥ 同上,第570页。